

明
前
期
卷

中国文学编年史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何坤翁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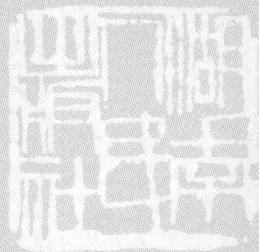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何坤翁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
前
期
卷

靈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前期卷 / 陈文新主编; 何坤翁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3-4

I. 中... II. ①陈... ②何... III. 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明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664号

1183

中国文学编年史·明前期卷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邓胜文 张志红 杨 纯 聂双武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4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796,000

书 号: ISBN 7-5438-4533-4/I · 450

定 价: 270.00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何坤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985建设项目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明史·选举志一》：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经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诸生应试之文，通谓之举业。《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其后标新领异，益漓厥初。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譎。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禎比晚唐云。

《明史·选举志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澧《集说》。

《七修类稿》卷一四《国事类·南北卷》：国初会试，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观建文死节之士可知矣。《余冬序录》以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见《三朝圣谕录》载，仁宗时，杨文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宴驾，宣宗行之。

《七修类稿》卷一四《国事类·本朝科场》：本朝科场，自洪武三年。第一场：经



义一篇，限五百字；四书义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场：礼乐论，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场，时务策一道，务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场之后，骑，观其驰骤便捷；射，观其中数多寡；书，观其笔画端楷；律，观其讲解详审。此乡试、会试之式也。殿试亦止策一篇，却是时务。其时取士，各省四十名，广西二十名，南直隶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

《柘轩集》卷四《送金元哲之官分水序》：圣朝之设科也，本德行而兼六艺，黜词赋而崇礼乐，盖有合于成周三物教民宾兴之意。若明经对策，则又斟酌汉唐之制而加详焉。是欲底于实效，非徒事乎虚文而已。一时之士，咸喻上意，莫不鼓舞奔走以图报。

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叙》：馆课者，录秘馆教习士日课也。溯自高帝，重史局之选，于赐第后简二十八人于廷，晋之秘苑，上应列宿，而又推择廷臣中文行兼长者二人为之师。月给笔札，日食大官，而且銮舆时幸，以督课之，盖其重也。列圣耀德，益慎其选。惟弘、正中馆职稍弛，而程篁墩学士乃有“绿阴亭上看医书”之讥。然时馆课有程，亦不废也。

《泊庵集》卷三《溧阳县学乡贡题名记》：进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几千年，贤豪俊父之出不可胜计。圣明统一万方，诏天下立学，既岁贡其士子之贤者，又取之以进士之科，此与成周乡举里选之法并行不废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于熏陶消化使人人自趋于善，禁制防范使不失其性，则三代以下未尝有也。由是海隅边徼万里之外，皆翕然响应。

《东海张先生文集》卷一《九峰倡和诗序》：窃念我朝取士，专以经术，略于辞华。故每科赐进士第者多或三四百人，深于诗者百不三四人。

张弼《梦庵集序》：古之为诗也易，今之为诗也难。何哉？商周汉魏弗论已，声律之学，至唐极盛。上以此而取士，士以此而造用，父兄以此教诏，师友以此讲肆。三百年间，以此鼓舞震荡于一世。士皆安于濡染，习于程督，稍自好之，皆能为之，为之者不亦易乎？沿及宋、元，犹以赋取士，声律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极，治复淳古，一以经行取士，声律之学为世长物，父兄师友摇手相戒，不惟不以此程督也，为之者不亦难乎？是故进取之士，非兼人之资、博洽之学，虽或好之而鲜克为，纵为之而鲜克工。

《明史·文苑传序》：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

宋濂《凤池吟稿序》：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词之或异耳。濂常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曲以畅，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



然，览乎城阙宫观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锵而铿锵。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

宋濂《刘槎翁先生诗选序》：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肝琢髓、宵吟朝咏，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浅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盖不得助于清辉者，其情沉而郁；业之不专者，其辞芜以庞；无所授受者，其制涩而乖；师心自高者，其识卑以陋；受质蹇钝者，其发滞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虽其格律有不同，声调有不齐，未尝有出于五者之外也。

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而要其极，有不能合者。……我国朝扫除荒乱，奄有六合，光岳之气全得于天。自高皇时，宋学士景濂诸公首任制作，而犹未得位。文皇更化，杨文贞诸公函起而振之，天下之休养涵育，以暨英庙之初，富庶之效可谓极盛矣。而刘文安诸公出焉。逮于宪庙，其用犹未已也。时则有若文僖公，相与先后扬厉。

丘浚《刘草窗诗集序》：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其后举业兴而诗道大废，作者皆不得已而应人之求，不独少天趣，而学力亦不逮矣。

《艺苑厄言》卷八：梁时使臣至吐谷浑，见床头数卷乃《刘孝标集》。天后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宝购张鷟文。大历中，新罗国上书，请以萧夫子颖士为师。元和中，鸡林贾人鬻元、白诗，云：“东国宰相以百金易一篇，伪者辄能辨。”元丰中，契丹使人俱能诵苏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币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鲜国上言，愿颁示关西吕某、马某文以为式。所谓一解不如一解。

崔琬《胡氏集序》：国家以科举登士，以法律理官，为业易能，求仕易就，故遯学工文之儒，逊于往代。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乐而后，乃可得而称数云。方天台辞若苏氏，言必道周、孔。大哉志乎！东里少师入阁司文，既专且久，诗法唐，文法欧，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罗玘思振颓靡，独师韩子，其艰思奇句，伟哉！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入对大廷，文制古辩，元老宿儒，见而惊服。其时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协表诗法，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二子抗节遐举，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学者尊如李、杜焉。宣德中，河东文清公出，学曰复性，旨曰宗朱，直道进退，足冠一时，不屑议文矣。今日古书渐见，士操笔必期周汉，而昌黎亦见轻也。

《槎翁诗集》卷首提要：当明之初，雄才角立，吴中诗派昉于高启，越中诗派昉于刘基，闽中诗派昉于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而江右诗派则昉于嵩。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豫章人士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而骨力不坚，久之



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阳乃乘其弊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门户。〔按，凡言“某某集卷首提要”，指该书已为《四库全书》所著录，其卷首提要与四库提要不全同，编年引用为其卷首提要〕

陆深《李世卿文集序》：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然要而论之，盖有两端：以雕刻锻炼为能者，乏雄深雅健之气；以道意成章为快者，无修辞顿挫之功。故修辞类于雕刻，而雕刻者辞之弊也；道意成章者近于雄深雅健，而雄深雅健又不止于成章道意而已。大抵深于学，昌其气，然后法古而定体。

邵经邦《艺苑玄机》：国初诗，好者是元，如杨铁崖、解大绅。成化间，好者是宋，如陈白沙、庄定山。至弘、德、嘉靖以来，赅赅乎盛唐矣，如何大复、李崧峒。

陈文烛《明诗正声序》：洪武初，沿袭元体，颇存纤词，时高、杨为之冠。成化以后，海内和豫，缙绅之声，喜为流易，时程、谢为之宗。及乎弘、德，文教大起，吾楚李文正公为词林文学之冠，开阁延贤，推毂后进，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时李、何为之倡。

卢纯学《明诗正声叙》：我明兴之初，高、杨、张、徐首倡国朝之音，聿变季元之陋。至弘、正间，北地、信阳力挽衰颓，振宣风教，而嘉、隆、万历大雅辈出，家握寸珠，人怀尺璧。

陈英《九大家诗选序》：国朝以诗鸣者，无虑数百家。洪武初，尚沿元习，积之深，更之或惴惴未暇。及成化以降，海内和豫，缙绅之声，啾缓典畅，而长沙辈出，未克振也。迨何、李崛起，一创而变长沙，七子接武，再创而变北地、信阳，彼所谓能正其变者也。

赵国璧《批点明诗七言律序》：余阅之至竟，则见洪武、永乐间诸诗气浑沦不散，似唐之贞观、永徽。宣德、成化文词渐入宏丽，似神龙、开元。弘、正、嘉、隆、万历以来，若何仲默、李献吉、李于鳞、王元美诸人，皆以英迈之气发弘深之思，磨砢岁月，流连光景，故与盛唐李、杜、岑、王诸大家相颉颃，洋洋乎称风雅矣。

《升庵集》卷五四《胡唐论诗》：胡子厚与予论诗，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姑以画论，晋有顾恺之，唐有吴道玄，晋唐未尝以画取士也。至宋，则马远、夏珪不足为顾、吴之衙官。近代吴小仙、林良，又不足为马、夏之奴仆。画既有之，诗亦宜然。谓之时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荐与予书，论本朝之诗：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蕡、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近日好高论者曰，沿习元体，其失也瞽。又曰，国初无诗，其失也聋。一代之文曷可诬哉？永乐之末至成化之初，则微乎渺矣。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洲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旁门。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



《翰林记》卷一一《正文体》：国初文体承元末之陋，皆务奇博，其弊遂寝丛秽。圣祖思有以变之，凡擢用词臣，务令以浑厚醇正为宗。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谓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直，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其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於戏！大哉皇言乎！万世之通训也。然近日文体或务追秦汉，而失之险；或驾言韩欧，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风靡者多矣。举圣谟以戒敕之，是在当宁。

四库提要卷一九〇《明诗综》：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

《池北偶谈》卷一四：海盐徐丰崖《诗谈》：“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于今为烈。”当时前辈之论如此。盖空同、大复皆及西涯之门，乃撰《列朝诗选》者力分左右袒，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

鲁九皋《诗学源流考》：明代诗家，最为总杂。开国之初，青田刘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经纶之余，形于歌咏。当其未遇，已见知于道园虞氏，道园称其“发感慨于性情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言，体制音韵，无愧盛唐”。次则吴中四杰高季迪启、杨孟载基、张来仪羽、徐幼文贲，并有倡始之功。而是时刘子高崧起于江右，孙仲衍蕢起于岭南，林子羽鸿起于闽中，又有张志道以宁、袁景文凯相继而作，可谓一时之盛。第旧体初变，扫除未尽，就中求其庄雅纯净诸体皆备者，其海叟乎？青丘才力虽大，歌行而外，他体不无元习；孟阳而下，抑又芜已。永乐以还，崇尚台阁，迄化、治之间，茶陵李东阳出而振之，俗尚一变。但其新乐府，于铁崖之外，又出一格，虽若奇创，终非正轨。嗣是空同李氏、大复何氏大声一呼，海内响应，又得徐昌谷祯卿、边华泉贡为之辅翼，称弘治四杰。

朱浙《秋崖方先生文集序》：文章随世高下，不其然乎？夫言因气机之动而为之者也。人之气，与天地之气相为流通。天地气运方隆，而生于其时者，其禀受深厚，器度大雅，而见于言语文字，亦多肖其为人。文称西汉，诗宗盛唐，后来作者不乏，其大致尔殊也。我朝气运隆盛，成化、弘治之间，文章巨卿，彬彬辈出。

陈仁锡《明文奇赏序》：自古人文之盛，未有逾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沉毅，文宪立谈即雍雅。盖未有不淡于势利而能文章者，于是有辞官辞荫，三幸第而计画秘不传，如陈静诚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长谋略则文成参帷幄；擅国华则文宪总儒学；精吏事则章中丞等司屯田。一议礼也，大配、袷褙、斋戒、五祀、朝会、祝祭、军礼，各专一曹，无越畔云。当是时，王忠文进《平江西颂》，高皇帝喜曰：“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无人品则寸心安在，谁与较失得哉？解大绅而归之，俾读十年书，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间，不以定志

立品为第一义，岂不负遭遇哉？文皇帝赐儒臣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栋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眈绚绮疏。忽已灿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求启发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彩临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勗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致治希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奈何不读书！列圣追琢造就至于今，熏习雅化，作者辈出。辄惟嘉、隆以来，一家之言最盛，溯而上之，成弘、洪永，高文典册，若存若亡，岂非缺事？爰取往昔遗稿，论次臆评，续编再出，读者雄于才思、澹于势利，可遥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谓文治绸缪绵绵，若见文武之叮咛，故享国最长。不知《周易》一系，与天无极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尧舜在上，禹、皋、稷、契无文誉。高皇帝万几之暇，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至于诏谕遐方、明烛万里。盖常嗤韩愈以风托比奸邪，作文讥之，欲儒者著笔勿高而下、低而昂，钦天畏地，思精言以无疵。驳《颂伯夷文》曰：“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诬耶？妄耶？”又曰：“万物必究其端而穷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己意之顺，乱乾道之顺；以己意之逆，乱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贤者识其大者，奈何不遵式？仁锡庄诵《御制全集》，所载唐参政蒙恩，凡作文必书“耐久道人”，已皆厌之，罢求其文。同年，内黄县令沈仁致仕，文必书其官，趋如流水，户门之限，三日一换。旁一人目嗅：耐久有黄精蕨薇之气，似山林；沈仁有芬芳御饌之气，似馆阁。及参政过沈仁门，妬乞文者而争，仁答辱之。参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轻君爵而美山野，文书‘耐久’，诚可辱。”遂悟而止。于是，上《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曰：“朕观耐久之错将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则可谓善矣。”洪武九年，灾异求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五事，盈一万七千字。初命中书郎中王敏诵，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召分迂、俗，不对，扑之。次日，上又令诵其言，至一万六千五百，方见五事，字仅五百。当日叹曰：“为臣不易，茹太素是也。”敕行四事，遂立上书陈言之法，颁示天下，过式者问之，作《建言格式序》。仁锡庄诵二训，今天下之文称谓失伦，漫漶不实，唐参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读有用之书，遵当代之式，可与细论文哉。

俞允谐《题三异人文集小引》：卓吾李贽、予既录三异人行实，因取其生平著述读之，觉英雄欺世，不顾后来更有具只眼者也。然其确然自以为是，虽使刀刃在颈、雷霆在顶，终不少为屈抑，而况区区祸福与死生乎？今其文具在，非必定皆不易之论也。出于三人之下自今，人不可移易，何哉？彼盖不求媚于世而神情独往，真可前无古而后无今，孰谓文字为雕虫之技已哉！遂为编次如左。正学之文从笃学力行中得来，有欲担扶世界之想，似韩昌黎；至如雄伟跌宕，亦可方苏子瞻。忠肃力量最大，是第一等伟人，读其奏疏，不独救时，兼可垂后，可方陆宣公氏；若论功业，则我明一人而已。忠愍之文不多见，即劾鸾、嵩二疏，上救荒一书，激切似贾生，而力量过之；如梦大舜而知乐，因讲学而进德，可方正学；劾鸾不已，继之贼嵩，非真心爱君、真不怕死而能之乎？可方忠肃。三人真可鼎足而立矣！读其文如其人，观者慎毋茹其华而忘其实也。



慎蒙《皇明文则序》：昔人谓文章有关于气运，其知言哉！其知言哉！盖气有厚薄，则文亦随之以高下。故自汉而唐而宋，有《文选》《文粹》以及《文鉴》，播之当时，传之后世，均之三代，名世之作也。然而体裁各别，法眼具存，文以时迁，信矣。迨入明朝，则有《文衡》之集，集乃出于程公克勤所为编纂，亦哀然国初之文苑也，惜诸所著作犹未脱元习，如唐之沿六朝、宋之沿五代。要之，气与运会使然，非人力所能与也。迨至孝庙，世际熙洽，稽古右文，时则有关西李子崧岷者出，力追古制，号为中兴。一时徐、何彬彬辈出，驰骋艺苑，悉凭旧习，駸然几于古矣，所谓“花发上林，月晃淮水”者非欤？第《文衡》之选，识者议其未精，而传之数纪，嗣后作者皆散见诸帙，间有《文选》《文苑》之刻，或以简而遗，或冗而滥，此昭明登坛之选所为独步也。予高卧林泉，颇游心坟籍，遂妄以己见删其旧之冗者，增其今之未入者，录其文之有为者，削其文之空言无当者，勒成一书，名曰《皇明文则》，庶诸杰作与国初名公争雄，岂非昭代文明之会哉？或以文自西汉而后，渐非近古，至唐宋重有议焉，况我朝以举业取士，故遂学工文之士逊于往代，文其难言哉！予以为文者以明道纪事，是谓立言，必造诣深然后理明，理明然后词达，未有不得于理而能善其文以行之远者。故曰：“美则爱，爱则传。”古已记之矣。彼出之无本，而专事缔绘章句以为工，是技也，扬雄所谓壮夫不为，文云乎哉？后世溺于所习，悉昧本真，言文者必以秦汉为宗，舍此则如禅家下乘，遂落言诠矣。不知九锡之文、剧秦之论，果何为者？又如《玄经》之作，矩步爻象，至有高之青天、深之黄泉之喻，古矣。然刻意险棘，旨浅辞深，不关世教，孰与诵而传之？后世竟无知子云者，可征也，况其下焉者乎？故文之华实并茂，而直超独诣者传，犹之珠玉琛奇之见宝于人也；有所发明，关乎世教，而足以羽翼六经者传，犹之布帛菽粟之济世。其为相悬也，亦甚远矣，岂曰陶匏黼黻，均为娱悦耳目之玩已哉？况我明开国，有刘、宋、苏、王首辟文运，领袖艺苑，以润色丝纶；继以崧岷，为文之始伯，而遵岩、荆川、念庵、槐野之四子者则擅其宗；方逊志为理学开源，而导流者则吴康斋以及一峰、阳明诸君子。观其形之议论，敷之奏疏，见之裁答，非耿耿不磨之见（如方逊志正统、深虑、豫让、武王、启惑等论），则濂洛关闽之传（如阳明与人论学书），非达权通变之神（如阳明攻剿濂头、宸濠诸疏），则纲常忠爱之极也（如一峰劾李文达疏、余肃愍参不当与虏讲和疏、庄定山培养圣德疏）。是人品也，才也、学也，合而一之者也。故曰，其人圣则其文为经，其人贤则其文为史。谓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者，指时与文言之也。尝见祝枝山与人论文云：元与本朝之文，虽佳者亦无多，厕其否者，请与绝迹。区区以文体绳之，而遂谓明兴无文，是务枝叶而忘本根，尚昧于技文之辩者也。吾不敢以祝子之言为然。

皇甫汈《皇明文范序》：我明稽古，人文化成。新安所编，名之曰《衡》，则亦铢较而两差矣。是岂才识弗若萧氏与？文关气运，世道使然也。即而论之，缀骚献赋，岂复有如屈、宋、贾、马者乎？赓歌第颂，岂复有如皋、朔、渊、云者乎？铭非孟坚，畴勒鸿勋？碑谢伯喈，宁免愧色？箴非女史，颂异贤臣。试举一二，足例其余。至若魏挺应、刘，晋推潘、陆、徐、庾、阴、何，由此其选也。然视彼“二京”，瞠乎其后矣。

黄宗羲《明文案原序下》：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濂〕、方